

毛礼锐 主编

中國古代教育家傳

中国古代教育家传

毛礼锐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教育家传

毛礼锐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16 千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 500

统一书号, 7243·448 定价, 2.50 元

前 言

中国教育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教育家。可以说，悠久的历史发展史和优良的教育传统培育了教育家，而教育家的活动和思想又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丰富了教育遗产的宝库，汇集成价值极高的思想财富。

《中国古代教育史》一书的编写，就是要将古代教育史上影响较大的著名教育家加以研究、评述，介绍给广大教育工作者，以扩充教育知识，提高教育理论素养，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使今天的教育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增强从事教育工作的荣誉感，激发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自信心。

本书选择的从孔子到颜元共二十位古代教育家，都是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在某些方面有突出贡献，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活动的教育家。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有差别，对教育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有时见解相左，有时又相互吸收和融合，形成异彩纷呈、风格独特的局面。这正是教育家成长、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辩证法。我们正是要在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教育家长期论争和融合的过程中捕捉教育思想的真理的颗粒，深化对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

本书在编写中，对每位教育家的生平和教育活动都做了扼要的介绍，以利于了解教育家的理论和经验形成的条件和过程。然后，着重介绍教育家教育思想和经验的主要方向，如：教育的作用、地位、目的、内容、道德教育思想、教学思想、教师和师生关系……等。根据每位教育家的具体情况，编写的体例不强求统

一，介绍的重点也不要求千篇一律，以利于展现每位教育家的特点和个性。在介绍教育家的思想观点时，以如实地阐述为主，不作更多地评论，以利于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思考、去鉴别，为读者保留更多的思索回旋的余地。古人主张学思结合，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说：“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就是说必须掌握丰富的思想资料，进而深入思考，然后才能有深刻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我们的目的重在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料，请读者自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本书的作者有多年从事教育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年人，更多的是一批中年骨干，也有几名年轻的新兵，可以说是一支新老结合的队伍。一批中青年日益成为教育史教学和科研的主力，显示出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王炳照同志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教育史教研室的有关同志参加过一部分组织工作，谨致谢意。

本书的不足之处，甚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候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毛礼锐

1986年元月

目 录

孔 子	王炳照 (1)
墨 子	雷克啸 (25)
孟 子	程舜英 (38)
荀 子	郭齐家 (56)
董仲舒	张鸣歧 (76)
王 充	苗春德 (94)
颜之推	尹德新 (112)
嵇 康	毕 诚 (123)
王 通	程舜英 (142)
韩 愈	曹剑英 (157)
胡 瑗	程方平 (172)
张 载	白应东 (187)
王安石	俞启定 (209)
程 颐	白应东 (227)
朱 熹	王炳照 (249)
陆九渊	郭齐家 (281)
王守仁	毕 诚 (307)
黄宗羲	李国钧 (333)
王夫之	宋元强 (360)
颜 元	刘德华 (381)

孔 子

王炳照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著名的伟大教育家，他对我国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及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早已驰名中外。了解孔子的教育活动，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始终是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说，不了解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就无法了解中国的古代教育；而不了解中国的古代教育，也就不能更充分地认识今天的中国教育。因为今天的中国教育乃是昨天的中国教育历史地合乎规律的发展。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二岁，一说七十三岁。

孔子的祖辈原是宋国的贵族，由于贵族内部的相互倾轧，逃奔鲁国，到他的父亲孔梁纥时，^①已没落为下级武官，失去了贵族的显赫地位。

孔子三岁丧父，家境相当贫寒。由于其母颜征在“生而有贤德”，^②精心抚育，严格督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孔子从小立下勤奋好学的志向，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尝陈俎豆，设礼容。”《论语》中

①《左传》作鄯叔纥，《史记》作叔梁纥，盖名纥，字叔。

②《孔庭摘要》，卷一。

《八佾》和《乡党》两处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都反映了孔子少年时期好学心切、学礼志笃的精神。

孔子生活的鲁国历史悠久，保存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公元前543年，孔子年八岁，以让国著名的吴公子季札出使到鲁国，听到鲁国保存的周朝和各国的乐歌后曾赞叹不已。^①公元前540年，孔子年十一岁，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象》和《鲁春秋》，也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慨。^②丰富的文物资料和浓厚的文化气氛为孔子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③正表明他在少年时期就确定了坚定的学习志向。可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鲁国承袭的全部古代中原历史文化长期熏陶、孕育的结果。

孔子大约在二十六、七岁时，先后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官级虽低，但能尽职尽责，使帐目清晰、牛羊肥壮，表现出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又说：“吾不试，故艺。”^④说明孔子虽有远大志向，但并不好高骛远，鄙弃实际工作。因此，他在青年时期有机会广泛接触下层、了解人生、熟悉社会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掌握了多方面的技艺。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多才多艺，会唱歌，会演奏多种乐器，会射箭，会驾车，会相礼，……为做一名称职的教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孔子在三十岁左右，学问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他自称“三十而立”。^⑤当时，随着王官的失守和一部分贵族的破落，原来贵族垄断的文化知识，逐渐散布到民间，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⑥孔子顺应时代的潮流，冲破“学在官府”的

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二年》。

③《论语·为政》。

④《论语·子罕》。

⑤《论语·为政》。

⑥《左传·昭公十七年》。

桎梏，创办私学，开辟了私人聚徒讲学的道路。由于他的私学实行“有教无类”，^①明确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②鼓励人们“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③教育内容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教育方法也很新颖得当，对于渴求文化知识、希望参与政事的以士为首的平民阶层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孔子在壮年时期是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的。他创办私学，最初主要把教育作为从政的一种手段或准备。他在讲学过程中，一方面自己积极寻找从政的机会，准备从政的条件，另一方面精心教诲弟子，希望他们随时担负起行道济世的重任。因此，他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一般文化知识，而且重点突出德行培养和性情陶冶；不仅注意在学舍讲论，而且走向社会、周游列国，以增加实际经验。他在三十五岁左右游历齐国，就是带领第一批弟子，师徒同行，随问随答。这也是孔子后来从事教学的基本方式。可以说，孔子创办的私学，不仅在办学形式，而且在讲学内容和方式上，都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公元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曾得到一次直接从政的机会，当过鲁国的中都宰，不久又升为大司寇，并代行相职，但仅三个月就被迫下台，离开鲁国，奔走于宋、卫、陈、蔡之间，度过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涯。但在颠沛流离中，仍能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在宋被困，“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在陈绝粮，“讲诵弦歌不衰”。^④

公元前484年，孔子六十八岁，终于结束了十四年的漂泊生活，回到鲁国。这时，他已经看清“道之不行”的真正矛盾，决心把全部精力放在文化教育上，一方面致力于整理古代文化典

① 《论语·卫灵公》。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子张》。

④ 《史记·孔子世家》。

籍，一方面从事教学，培养人材，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后世流传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差不多都经孔子搜集、整理、加工，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并在当时已成为教育其弟子的基本教材。

孔子晚年生活是相当悲哀的，政治上不得志，屡遭世人冷遇，甚至多次受到无谓的侮辱和毁谤。然而由于他献身教职，并且取得卓越的成效，却深受弟子门人的敬仰和爱戴！

总之，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和整理古代文化，弟子多达三千人，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卓著的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论语》一书二十篇，是孔门弟子辑录的孔子言行录，也记载着一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是我们研究孔子教育思想所依据的主要资料。

二、主要教育思想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极其丰富的，涉及到许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和多方面的教育实际问题，他在二千年前的许多看法对今天的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教育工作，仍有不少启迪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是基于对文化教育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学记》中集中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最早正是来源于孔子。

孔子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第一，教育和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的关系。孔子认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作，不一定直接去做官才算参与政治活

动。因为通过文化教育工作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去，这样就会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就是说，通过文化教育工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尚传播开来，就会影响政治或执政者。可见孔子认为教育工作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教育工作又不是与政治等同的，而是通过传播文化，培养人们的道德风尚等特殊职能，对政治施加影响。后世人们把教育与政治等同起来，乃是对孔子基本思想的一种误解。

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还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其富足起来，更要加强教育，提高其文化素养。

《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众多的人口，富足的经济，发达的教育，三者具备，这个国家就大有希望了。在这里，孔子已经初步意识到人口、经济和教育有某种辩证关系的道理，这是十分可贵的。

孔子还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立国的基本条件，甚至认为在不得已时，食、兵都可去，民信不可失。《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里，孔子强调通过教育工作取得民众的信任，使民众有坚定的信念和充分的信心，是立国的根本，包含着深刻的道理。但如此夸大民信的决定作用，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作用，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这是他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事实上，去兵、去食，也就谈不上取得民信了。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只靠政令、刑律，不如德治和礼教，因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有“道之以德，齐

之以礼”，才能做到“有耻且格”。^①因此，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有人曾把孔子反对晋国范宣子铸刑鼎之事，作为孔子拥护奴隶制的证据，结论似乎过分草率和简单化了。联系到孔子轻政刑、重德教的基本思想倾向，不妨说孔子反对铸刑鼎，意在强调德治、礼教的重要。

在孔子看来，治国治民，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最根本的措施还是加强教育。他把教育提到很高的地位，显然是过分地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但是，联系到春秋中后期，统治者热衷于横征暴敛、苛政酷刑和武力征讨，而造成学校不修、文教不振的社会现实，孔子特别强调教育的作用，极力抬高教育的地位，还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历史进步作用的。

第二，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孔子还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论述了教育的作用。他承认人的成长，教育起着决定作用。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②人的本性是很接近的，后来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别，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人的聪明才智不是先天固有的，主要是靠后天习得的。无论何人，只要肯努力向学，就一定能获得成功，《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他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的，“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③

当然，孔子不可能完全摆脱先天决定论的羁绊，仍然承认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④他的本意可能还是鼓励人们奋发学习，不要做困而不学的下民，但毕竟他还是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者和学而不能的下

① 《论语·为政》。

② 《论语·阳货》。

③④ 《论语·季氏》。

民，甚至还武断地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①从而使他的思想陷于混乱和自相矛盾之中，表现他世界观上的严重局限性。

长期以来，奴隶主贵族迷信天命、鬼神，坚持先天决定论和血统论。春秋中后期，天命思想和鬼神观念有所动摇，但仍然占有很强的统治地位。孔子能够明确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充分肯定了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决定作用，无疑是顺应并且推动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历史潮流，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尤其是对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根据。

人性与教育的关系是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在孔子之后，如孟子、荀子、董仲舒、王充、韩愈、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元等都曾根据不同的时代和自己对孔子有关论述的理解加以发挥，有的强调“性相近，习相远”，有的强调生知学知之别，有的则力图折衷调和，掩饰孔子思想的矛盾。但是，由于他们都没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既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正确把握孔子本人的思想。事实上，孔子的主导思想是调强“性相近，习相远”，肯定教育的决定作用，这是他的思想中的精华，但他的思想中确实还为旧的传统观念保留着一块地盘，没有抛弃上智下愚的老调。对此，应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二）关于教育的对象

教育对象问题，即什么人应该和可以受教育，也是许多教育家关注的问题。孔子在春秋末期，面对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的社会现实，从“性相近，习相远”的理论前提出发，极力主张扩大教育的对象，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②

“有教无类”的基本含义，就是主张打破少数奴隶主贵族对

①《论语·阳货》。

②《论语·卫灵公》。

文化教育的垄断，扩大教育的对象，改变那种只有“仕官”才有受教育机会的局面，使那些愿意学习而在学力、经济条件和时间上又允许的人，不论贫富、贵贱以及“国别”，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力和可能，为士民阶层创造了受教育的条件。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①“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②只要诚心求教，潜心问学，都要热心教诲，不管他们过去的经历和表现，都应一视同仁。

孔子在创办私学，聚徒讲学的教育实践中，广收门徒，实际贯彻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在其三千弟子中，有鲁国当政贵族子弟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有被称为“鲁之鄙人”的子张和“贱人”之子仲弓父；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之子贡，也有蓬户瓮牖、振襟见肘的原思和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以及亲自耘瓜、母亲自织的曾参和身着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还有食藜藿、百里负米以养母的子路和居穷阨巷、穿敝衣冠的原宪，而公冶长竟是曾在缧绁之中的犯人；有北方的卫人子夏，陈人子张，也有南国吴人子游。在平时向他求教的人中既有各国当权的贵族，又有互乡童子和四野鄙夫。说明孔子主张“有教无类”确实在其教育实践中有所体现。南郭惠子曾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槩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③正说明孔门弟子是良莠不齐的。孔子相信教育的巨大力量，相信教师可以象良医治疗疾病、槩栝矫正枉木一样，使各种人化恶为善、化愚为智。这正是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基础。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是顺应社会历史进步潮流，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趋势的。

当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不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受教育或人人可以受同等的教育，更谈不上主张普及教育。应当看到，

①②《论语·述而》。

③《荀子·法行》。

孔子一方面主张“有教无类”，另一方面又宣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②认为下等民众不必受教育，或不能受同等的教育，仍然坚持教育的等级性，这又是“有教无类”的严重局限性。

教育对象的扩大受着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能够随意决定的。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既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三）关于教育的目的

孔子从“为政在人”的政治主张出发，一方面提倡“礼贤下士”、“举贤才”，要求吸收和重用社会上已有的贤能之士；另一方面通过创办私学，致力于培养士、君子和成人。子夏明确地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③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尽管对这句话的解释历来存在着分歧，但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把官职与学习紧密联系起来，则是无可怀疑的。有官职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并能继续学习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得到一定的官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造就这样的能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孔子的这个思想在《论语》一书中还有多处记载，从中更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并表明子夏的话确实代表了孔子的这个基本思想。例如，《论语·先进》载：“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就是说，先学习了礼乐知识而没有取得什么官职的人被视为鄙野之人，有了官职后才去学习点礼乐知识的人反而被称为君子，如果由我选用人材，我宁可用前者，正表明孔子主张学习礼乐知识之后才应获得官职。同一篇又记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贱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

① 《论语·泰伯》。

② 《论语·雍也》。

③ 《论语·子张》。

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让学习未成的子羔去任官，孔子说这样会害了这个人，子路强辩说，有了官职，能够处理政事，治理民众，何必一定读书，才算学习呢。孔子对此严加斥责。《公冶长》篇还记载：“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悦）。”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认为自己学习还不够，对此缺乏信心，感到把握不大，孔子听了很高兴，充分肯定了这种态度。孔子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只有经过教育、学习才应取得官职俸禄，所以，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①极力反对无学而受禄的人。

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统治日益腐朽，不学而仕，仕而无学的现象相当普遍。随着私学的兴起，士阶层的壮大，又出现了学而不能仕的尖锐矛盾。孔子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有力地冲击了“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的宗法观念，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

当然，孔子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宗法观念，彻底抛弃“亲亲”原则，因此，他一方面提倡“举贤才”、“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又主张“故旧不遗”。这正是孔子所主张的教育目的的二重性。

（四）关于教育的内容

孔子从培养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的教育目的出发，在继承古代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加以充实和改造，提出了自己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

孔子主张教育内容应包括四个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② 教学科目主要是传统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使用的基本教材是经他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

孔子特别重视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教育，在教育内容中有关

① 《论语·卫灵公》。

② 《论语·述而》。

这方面的科目占突出地位，一般文化知识的学习服从于伦理道德教育的需要。他要求弟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在《学而》篇中更明确地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在有关伦理道德教育的科目中，孔子又特别重视诗、礼、乐。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②又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③他对“诗”的教育作用评价很高，“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④

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教育内容虽说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实际上偏重于武力的训练和鬼神思想的灌输。孔子在教育内容方面，一方面重点突出诗、礼、乐等伦理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也不忽视其他内容，尽量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和受到比较全面的锻炼，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尤其可贵的是，孔子在教育内容中排除了天命鬼神等迷信色彩的内容，“子不语怪、力、乱、神。”^⑤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⑥说明孔子强调教育要使学生认识社会、熟悉人事、了解人生，而不应把天命鬼神之类放在教育内容之中，这是孔子的一个重大贡献。在我国历史上，即使宗教传播甚盛的时期，宗教内容也难于进入教育领域，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

孔子的教育内容也具有严重的缺陷，一是忽视自然知识的传

① 《论语·述而》。

② 《论语·泰伯》。

③ 《论语·季氏》。

④ 《论语·阳货》。

⑤ 《论语·述而》。

⑥ 《论语·先进》。